

北魏时期的民族文化认同发展

董永刚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国立国之基、团结之本和力量之魂。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多元并进，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积极贡献，彰显了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包容与认同。对于我们的民族历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增进文化认同，就要尊重历史、凝聚共识，弘扬文化核心价值理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无论区域特征还是种族差异，都是一个长期不断演变和嬗进的过程，尽管其中有些领域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也不乏主动与被动之争。但从长期的角度看，进步始终代表发展的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学者陈世联先生曾撰文说：文化认同不仅仅只有归属感，也是一个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历史上的山西被誉为“古代民族融合的熔炉”，换句话说，古代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从传说中的炎黄战蚩尤、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秦汉时期的汉匈和战、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直至宋元明清，在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上，山西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可以说是继赵武灵王之后，黄河流域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上的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发展影响深远。

继两汉以后，4至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南下进入了中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山西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伴随着民族的流动和人口的迁徙，南北两地的民族文化交流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即汉

族南迁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其中，就北方而言，拓跋鲜卑统一十六国建立了“北魏”政权并大刀阔斧进行汉化改制，无疑是一时期民族关系发展中最大的亮点。从本质上看，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实质上就是通过冲破民族隔膜、消融意识鸿沟，完成了从民族意识革新到文化趋向认同的一个转变，这其中起到根本作用的就是对“大民族文化”的构建。

作为鲜卑族的杰出首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励精图治，统一黄河流域，开创了一个历史上北中国相对辉煌的时代，为后世历代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树立了楷模。当政期间，他在内外矛盾双重重压下，敢于打破民族藩篱，吐故纳新，主动吸纳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对本民族经济、政治及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就经济方面而言，他重视农耕，“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革新鲜卑族原有经济结构，在促进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的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基础，客观上缓和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使得民族间差异日渐缩小。

政治与思想意识上，孝文帝大胆冲破过去本民族单一的原始宗教信仰，积极向传统汉文化靠拢。他主张鲜卑人要“尊孔庙，沿周礼，立正统”。主动学习和借鉴中土先进的政治模式、思想文化，从根本上加快了鲜卑族“全盘”汉化的进程。尤其在“迁都”和“改姓”这两项重大举措上，孝文帝仅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以超人的魄力和胆略力克来自以鲜卑贵族集团为主的多方压力，完成了这两项令世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创举。众所周知，改革就会面对障碍，其对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阵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对孝文帝本人或者说以其为代表的鲜卑贵族也是一样。孝文帝尽管贵为“天子”，但为了确保类似迁都等涉及国运命脉重大举措的顺利实施，在某些小的问题上也曾有过隐忍，甚至是放低姿态、屈膝逢迎，但就最终目标，却始终没有退缩，而是一往无前，体现了孝文

帝作为政治家的远大抱负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雄才伟略。尽管说，孝文帝英年早逝，当政时间短暂，他所推行的改革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文化碰撞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正是这场革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的进程。

历史地看，孝文帝时期的变革无疑是成功的，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没有孝文帝的大一统政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唐盛世，更不会有中华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在北魏孝文帝革新的影响下，后世历代多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给古老的三晋大地源源不断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这一区域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保持了一种积极向上且积极进取的生命力，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为逐步形成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辉煌的中华古文化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土文化对北方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摄取，以及北方和外域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其深层次里蕴含着一种积极、包容与开放的民族精神。

山西作为中原的北方屏障与进入中原的通道，见证了历史上北方民族的盛衰与变迁，构成了一部丰富的少数民族发展区域史。研究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外域民族对中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探索其中的规律，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研读历史，一方面我们要学会通过历史来揭示不同民族间“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以及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格局的形成和不断进步，同时也是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动力源泉。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文化认同，我们还更应将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涵盖其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五代蒲州之战

李广浩

五代时期，驻守蒲州的节度使一直被称为护国节度使，蒲州的战略地位依然如故。乾佑元年(948)二月，后汉高祖刘知远卒，其子刘承佑继承皇位，时年18岁。刘知远在临终前，对手握重兵、反复无常的杜重威不放心，留遗诏诛杀之。驻守河中(蒲州)的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也是一位资格很高的实力派，听说杜重威被杀，产生了恐惧心理，暗地里准备抵抗。他在后晋时就当过上将，又有不少战功，平素好施舍，在士卒中很得人心。后汉建立的时间不长，刘承佑年少初立，朝中执政的都是李守贞的晚辈，所以李守贞看不起朝廷。李守贞招纳亡命之徒，加固蒲州的城墙，修内道，打造武器，昼夜不息。他还派人与契丹联系，其与契丹联系的信件多次被边塞上的官吏所截获。

三月，李守贞以新君年少，准备据守蒲州造反。此时，镇守永兴(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赵思绾叛汉，与李守贞联络，鼓动李守贞称帝。李守贞乃自称秦王，派遣骁将王继勋占据潼关。不久，刘承佑命令凤翔(今陕西省宝鸡东北)巡检使王景崇换防到邠州(今陕西省彬县)。王景崇不愿意换防，与赵思绾共同拥戴李守贞，三镇联合起来反汉。

三镇叛乱后，刘承佑派兵征讨，但各路将领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刘承佑感到必须派遣一位朝廷重臣担任平叛的总指挥，于是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路将领都受郭威的节制。

郭威与诸路将领商议作战方案，多数将领主张先攻取永兴、凤翔，镇国节度使扈从珂认为，针对三镇连叛的情况，李守贞为主，应该先攻取河中，李守贞灭亡，则永兴、凤翔两镇自破。如果放着河中没有打，舍近求远去攻打永兴、凤翔，有可能腹背受敌。郭威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集中兵力攻取河中，郭威自率军出陕州，令白文珂、刘词率军出同州，常思率军出潼关，三路兵马进攻河中。

李守贞以为禁军都曾是自己的老部下，受过他的恩惠，而且禁军一贯骄横，苦于后汉军法的严苛，所以他认为禁军一到就会敲开门奉迎他为君主。但是禁军士兵最近在郭威的笼络下，都忘了李守贞的旧恩，当他们来到蒲州城下时，挥扬军旗，擂响战鼓，个个奋勇向前，李守贞在城上观看，大惊失色。

白文珂攻克蒲州的西关城，在黄河西岸设营，常思在城南设营，郭威在城东设营。各路将领急欲攻城，郭威认为，李守贞是前朝老将，擅长打仗，又会笼络士兵；蒲州楼堞坚固，不能轻视；何况敌人在城上，攻城部队是仰攻，十分不利。作战是靠勇气，勇气有盛衰，进攻有缓急。根据实际情况，郭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部署民工两万余人，挖掘长壕，修筑堡垒，连绵数十里，把蒲州城包围起来。又部署水军在河岸守候，敌人有偷渡的，全部擒获。这样，蒲州城中的李守贞就像困在罗网中。李守贞屡次部署突围，都被击退，又派遣使者向南唐、后蜀、辽求救，皆被后汉军截获。到了九月，城里的粮食将要吃完，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守贞愁容满面。

公元949年农历正月初四晚上，李守贞派王继勋等率领精锐部队一千多人沿黄河南下，袭击后汉军队的营地。他们在堤岸上挖坑攀登而上，进入汉军的营垒放火，大声呼喊，军营里的士兵狼狈不知所措。刘词率领众将士反击，但众兵没有斗志，副将李韬说：“哪有太平无事时吃君王俸禄，有危急却不冒死搏斗的！”举起长矛带头冲锋，兵将跟随出击，城中的叛军退却逃跑，死亡七百人。

李守贞计划偷袭河西军营，先派人到后汉的军营附近卖酒，有的赊欠白给，后汉巡逻的骑兵大多喝醉，蒲州城中的士兵得以偷偷进入汉军的营寨，汉军的营寨几乎失守。郭威于是下令：除非是犒赏宴会，将领士兵都不得私下喝酒！郭威的亲信李甲，早晨喝了点酒，郭威大怒道：“你在我帐下，带头违反军令，我怎么来严格要求大家！”立刻斩首示众，军中再也无人敢私下喝酒了。

四月，蒲州城内没有粮食了，百姓饿死的有一多半。李守贞又发兵五千余人分五路从城西北角突围，又被后汉军击退，李守贞的部下死伤过半，突围的器械也被夺走了。五月初，李守贞再次出兵突围，又被后汉军击败。五月初九，李守贞的部下周光逊、王继勋、聂知遇率领一千多人出城投降。城中的士兵相继投降，郭威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五月十七，下令汉军对蒲州城展开全面进攻。

七月，后汉军攻破蒲州城的外城，李守贞领众退守子城。各路将领要求赶快进攻子城，郭威说：“鸟儿没处逃时还会啄人，何况是一支军队！把水慢慢舀干了再抓鱼，何必这么心急！”城中的李守贞因粮断力竭自焚而死，被重重包围了一年多的蒲州城，最终被郭威的军队攻克。

蒲州城攻破之后，郭威查阅李守贞的来往书信，得到许多朝廷权臣及藩镇大员和李守贞来往勾结的信件，言语大逆不道，郭威想上奏朝廷，但秘书长王溥劝谏：“魑魅乘夜争出，见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郭威采纳了王溥的建议，把这些信件都烧掉了，郭威此举，又笼络了一批朝臣和地方大员。

这次蒲州之战，说明了蒲州城在五代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郭威在这一年多的平叛战争中，笼络人心，在军队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三镇之乱平定，郭威势力坐大。一年后，后汉朝廷急于削弱重臣之权，密诏诛杀郭威，郭威起兵反抗，灭掉了后汉，建立了后周。可以说，后汉的灭亡，始于蒲州之战。蒲州是郭威的发迹之地。

黄河战事

闲话冬至

王春生

冬至，象征着一年中数九寒天的开始，民间也称之为“大冬”“长至节”“贺冬节”“亚岁”等。冬至也是一年时间里白昼时间最短、夜晚时间最长的一天，冬至一过，白昼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一直到次年白昼时间最长、夜晚时间最短的夏至止。夏至一过，白昼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夜晚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一直到冬至止。这样循环往复、年复一年。

冬至是“进九”的第一天。古时流传最为广泛的当属九九歌谣，记载最早的应是宋代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所录的那首：“一九二九，相见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笛；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儿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起出。”现今流传最广的九九歌谣是：“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些歌谣是对数九寒天生动的总结，借人、借动物、借植物的客观表述，也是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我的家乡晋源西山风峪沟店头古村，因属山区，一年四季的相对气温要比平川低2至3摄氏度，故此村民们结合当地环境、气温等气候条件，编出了一首九九歌谣：“一九二九冰上走，三九四九冻破碓臼，五九六九开门唤狗，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牛牛遍地走。”

冬至日，晋源西山一带原开煤矿的窑主，要给矿工放假一天，并承袭祭祀窑神的习俗；村中家家户户也要祀神祭祖，中午饭吃顿扁食(饺子)，犒劳肚子，重拾那久违的味道。这是村里人对平时粗糙、简单生活的改善，是家庭和谐、温馨的体现，一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扁食下肚，浑身暖烘烘、美滋滋，可谓是农家生活的一抹风景。

古代，人们很看重冬至节。古人认为冬至阳气生，而君道长，是乱而复治之机。自汉代以来，都举行庆贺仪式，到宋代为最盛。冬至前一天叫小至或冬至，当日叫冬至或大冬，后一天叫至后。节日三天，百官朝贺，君不听政，民间歇市，学子放假，故有民谚“冬至大如年”一说。旧时太原、西安、济南等地，官府庆贺冬至如同春节，读书人相互赠送贺片，士大夫阶层举行“消寒会”，民间则保留着多种涂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有的是画梅花一枝，素描勾出九九八十一朵花，每天用红笔或黑笔涂染一朵花瓣，花瓣尽而九九出；最雅致的是作九体对联，每联九字，每字九画，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如上联写“春泉垂垂春柳春染春美”，下联对以“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等。现今晋源乡村虽然涂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式微，但仍有一些人家保留着、传承着。

在明清之际，太原县冬至习俗中，还沿袭着由学董牵头，宴请教书先生、私塾先生。晋溪书院、桐封书院、晋泉书院的先生先带领学生去县城东街中段北文庙大成殿拜孔子圣人，再由学董分别带领学生逐一拜先生。当地民间有“冬至节教书”的谚语，讲的就是这种尊师习俗。旧时冬至节，太原县乡村习惯赠送鞋帽。《中华今古注》中说：“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曹植《冬至献袜履表》亦有“亚岁迎祥，履长纳衣”的句子。赠鞋帽于舅姑的习俗，当地逐渐演变成孩子过满月，舅姑赠鞋帽于甥侄了。至今仍沿袭。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的家乡的男孩子，习惯在冬至节结伴打“嘎嘣咪”，女孩子习惯踢毽子、玩“布疙瘩”等游戏，在玩耍中欢度冬至。

冬至节敲开了新年(元旦)的大门，过十天就是新年，新年一过，进入腊月，开启了喜迎春节、纳吉纳祥的门户。

晋民俗

青菜、粉渣渣和浆葡萄

韩银柱

青菜、粉渣渣和浆葡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清源西门菜市场上的三件宝贝。

西门菜市场自古就是贸易集散地，来自晋中、吕梁各地的商贩络绎不绝。清朝以来日渐兴盛，是三晋大地有名的蔬菜、水果、干果特色交易市场，民间有“金张兰，银晋祠，不如清源的烂菜市”之说。意思是说介休张兰盛产黄米喻为金，晋祠盛产白米喻为银，清源盛产蔬菜喻为绿。而蔬菜、水果的保质期短，易腐烂，西门菜市场每天都要把腐烂的蔬菜倒掉，故被称为“烂菜市”。

那时，一进入三四月，青菜是西门菜市场最早上市的蔬菜。青黄不接的春天，人们靠这青菜度饥荒，老百姓把它叫做“穷家菜”。清源人熬上青菜，下点小米，煮上面条或红面、榆皮面做的剔八股，用葱、姜、辣椒和调料进行烹调，就是喷香味美的“菜饭”。

喝粉渣渣是清源人的独创，其他地方没有。它是制作粉条的副产品——浆水，深受清源人青睐，据说清源“福春儿饭店”的粉渣渣最好喝。两三毛钱一担粉渣渣，打凉败火，经济实惠。记得小时候，跟着妈妈走六七里地，到菜市场买上一大瓶，回家后，倒入锅中，加上玉米子糝籽和小米熬成稀粥，喝到嘴里酸香酸香的。

清源是盛产葡萄的地方。冬天，果农把采收的葡萄储藏在窖里，将整串的葡萄拿到集市上去卖，或去做熏葡萄。散落下来的葡萄颗粒虽然不好卖了，但经过一冬的存放，水分蒸发了一部分，糖分增高了。产生贵腐霉菌的龙眼葡萄，清源人称之为“浆葡萄”，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来年春天，正是容易上火的时候，人们花上一两毛钱，吃上几颗浆葡萄，凉丝丝、甜滋滋，真是美极了。据说清源的浆葡萄尤以迎南风村的龙眼葡萄为最佳。

晋之味

沁水柳氏民居

朱文鑫

沁水县西文兴村柳氏民居，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地处太行、王屋、中条三大山系环抱中，为唐代诗人柳宗元遗族世居。这座独特的民居，融明清建筑艺术精华为一体，集南北建筑风格于一身，为中华古民居建筑艺术之绝品。

柳氏民居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山梁的东侧，东靠西文兴河，南临山谷，依托北山，起势作“凤凰展翅”。整体建筑分为三部分，外府区关帝庙、魁星阁、柳氏宗祠、文庙；中府区文昌阁、石牌楼；内府区府门楼、观河亭、后花园等。柳氏后裔柳遇春曾修建的一府十三院落大部分已毁于明末战乱，现仅存司马第、河东世泽、磐石常安、行遯天宠、堂构攸昭、中宪第、居处恭七个完整院落。

司马第院落门头上的九层斗拱，层层相叠，美不胜收，应该是我国古民居中最高的门楼；行遯天宠院落的门廊木雕，形色各异、争奇斗艳，共有30余种含义；河东世泽院落大门内置12道门栓，就是身处院内的人，若不知情也是断然打不开的。院落上空还布有铁丝网，地下修有地道，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可谓“天网地道”。府外三门，府内三门，12道门栓集于一门，极似世泽、磐石常安、行遯天宠、堂构攸昭、中宪第、居处恭七个完整院落。

柳氏民居现存石狮102个，几乎每座建筑都有，它们或蹲立在门枕石座上，或戏耍在抱鼓石上。这里的狮子形象总体造型取向浑厚，狮子的头、身、腿比例匀称，虽然也是张着嘴、瞪着眼，但神态上显得都比较憨厚，也有与传统狮子不一样的地方。无论大小狮子，它们的耳朵都是元宝形。

石柱础也是柳氏民居中石雕装饰的代表，柳家的石柱础形态多种多样，分覆盆式和方形两大类，和木构件一样，也有许多装饰，其中用的最多的是宝柱莲瓣，不但花瓣下端有卷起的漩涡纹，而且在花瓣上还有一个兽头，张着大嘴，衔着花瓣，围着柱石，有强烈的装饰效果，方形的柱础有四条或六条、形似香炉腿的基座，每条腿也有一个兽头张嘴衔腿，基座上的石鼓也布满了蝙蝠、如意、莲瓣、卷草等纹样图案。

在两座全石制仿木牌坊的夹杆石上，有八只教化狮子，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八只明代教化石狮。它们神态各



柳氏民居大门

异，寓意古代学子从求学到入仕的八个人生历程，意在告诫子孙后代时刻谨记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之理。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柳氏民居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民居内现存的历代名人书法碑刻达40余通，包括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圣人十哲图》、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说卦传》，以及明代文征明的《论俗四条》、王阳明的《孟子语》、方元焕的《四伦箴语》等，家家学严谨，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子孙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王阳明与朱熹这两大对立学派代表人物的书法碑刻同时在此发现，表明柳氏宗族博采众长、取各家学派精华为己所用的心迹。

柳氏民居的先祖，为唐代河东解州柳宗元的同宗。唐末永贞年间，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遭到贬黜，他的同族为了免受牵连而四散逃避，族中一支就隐居在此。历经宋元两代，河东柳氏族人游居历山一带，时至明代永乐年间，河东绛州公柳琛携妻杨氏定居沁水西文兴村，柳氏民居真实地记载了由明代的“官而商”到清代的“商而官”的社会发展史，揭开了河东柳氏家族百世书香门第的神秘面纱。

柳氏民居，就其建筑规模、艺术、工艺质量、建造技术来看，建造工艺水平极高，布局结构精巧，砖木结构十分坚固，仅大门的防御就有12道不同的暗锁，可见古人的技艺之精。那些名人丹青、大家墨宝、家训碑碣、精美壁画，也无不让人惊叹。整座民居凝结了建筑、绘画、楹联、木刻、石雕、书法等艺术的精髓，折射出古人的智慧。